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党组织在汤阴的主要活动

王之彬

汤阴是豫北重镇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日伪、地主、土匪武装林立，实行严密统治。汤阴人民深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剥削，灾难深重，民不聊生。为了反抗阶级敌人的反动统治和压迫剥削，中共党组织领导汤阴人民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各个时期党组织在汤阴的主要活动情况。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25年夏，“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在河南省立第五师范（简称卫辉五师）和牧野中学读书的汤阴籍青年任铭阁、苏仰之、何名臣、傅凌云、韩墨清等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并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任铭阁等受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指示回汤阴开展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是年9月，受中共豫陕区执委会之命成立中共汤阴县支部。任铭阁任支部书记。他们以教书作掩护积极开展活动。一是派党员苏仰之赴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后做农运工作。二是组织20多人参加了青

年学会，并创办《曙光》小报宣传党的主张。三是配合北伐做农民群众的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汤阴县党支部转入秘密活动，并继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于1928年2月开展清党活动，中共汤阴支部遭到破坏，支部成员三人被捕，党员成珍同志死在狱中。1931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

1934年冬季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傅凌云同志（东江窑村人）向本村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唤起群众觉悟，组织群众武装，对抗土匪武装，起到了保卫群众利益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其军队南逃。11月初，安阳沦陷，次年2月，日军侵占汤阴，先后对我司马、大性、东江窑、姜河、宜沟、任固、鹤壁等地进行扫荡，杀害我百姓数百人，烧毁民房数千间。他们抢劫民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共产党领导汤阴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日期间，汤阴人民配合人民军队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共党组织在抗日斗争中也不断壮大和发展。当时，中共冀鲁豫边区和太行区委先后在

汤东和汤西两地区建立了29个党组织，发展党员274人。

一、汤东地区

卫西工委建立党支部13个，党小组1个，发展党员70余人；二伏厂区委建立党支部2个，发展党员40多人；在“三心佛堂”中发展党员6人，这些均属地下党组织。党员均以教书、经商、行医、种地等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搜集日伪情报，使我军准确地打击敌人。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搜集到日伪向卫河东部沙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情报，及时将情报送到沙区根据地，使敌人“扫荡”扑空。并使我军有计划地对汤东地区的伪军武装进行围歼。如对盘踞在五陵镇的伪军石惠先部，菜园镇的司华生部，汪流屯汪怀秘部等进行围歼，三次战斗，歼敌一千多人，打击了敌人，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这些胜仗是与准确掌握敌情分不开的。二是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革命干部和抗日军队指战员。为了打破日军对沙区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卫西工委汤东委员会、二伏厂区委先后建立了两条地下交通线。一条是由卫河东沙区根据地出发，渡过卫河，经浚县老观嘴、三角村，汤阴的大青山、小青山、宜沟、三里屯、东西蚕姑冢、岔河、冷泉、柴厂、大小河涧、盘石头等村通向太行山根据地的南线秘密交通线；另一条是由内黄沙区经高堤、汤阴故城、安阳辛村、北务、崔家桥、洪河屯、庞佐，到达林县任村的北线秘密交通线。通过这两条交通线先后护送的领导干部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杨勇、舒同、黄英、肖华、吕正操、杨得志等及其他指战员5000余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友军，打击顽固之敌。如，1940年夏，中共冀鲁豫区委敌工部情报处长黄友若来到汤浚地

区，与地下党员傅凌云、胡紫青联系，利用傅与天门会会长杨贯一是亲戚、胡是天门会副会长常仙甫的女婿等关系，派去20名地下工作者，很快取得杨的信任。胡被任命为参谋长，傅被任命为秘书。利用合法的身份，对汤阴西南庞村匪首扈全禄进行了狠狠打击，并对日伪县长和特务等多人进行处决。经过长期的统战工作，杨贯一提高了觉悟，认清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于1945年8月14日宣布起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四是经常从敌占区采购工业品、军用物资和药品，运往抗日根据地。

二、汤西地区

1943年，根据中共太行五地委和军分区的指示在县西山区毛莲洞建立了中共汤阴县委员会和汤阴县抗日民主政府。邢真任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杨羽任县长兼大队长。先后在西盘石头、将军墓、大小宽河等村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反奸除霸、减租减息运动，组织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打退敌人多次的疯狂进攻。此外还经常组织武工队到京汉线破坏铁路，打击敌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日军投降后，伪军头目刘月亭窃取了胜利果实，摇身变为国民党的军长，并搜罗汤阴的地方顽杂司华生、扈全禄、牛万山等为部属，他们疯狂向路西解放区进攻，使汤阴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冀鲁豫军区第四、五、六团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与太行独立团、五十团等在汤阴县委县政府组织的3500名民兵的积极配合下，经过七个昼夜的奋战，采用“坑道爆破”的作战方案，于1945年9月29日攻克汤阴城，歼敌5个团，俘敌师以下官兵2700

余人。两周后，部队主动撤离汤阴城，汤阴再次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10月20日，盘踞汤阴城的孙殿英部纠集5000余人分两路进攻县西根据地，狂妄叫嚣要“吞并林汤，占领涉武，威胁太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占鹤壁、鹿楼两镇。当时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县委成立了“前方指挥部”，县委书记李衍授任政委，县长王大海任指挥长。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一是上山打游击保存实力；二是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活动；三是掌握敌情积极给上级党委和部队汇报，争取部队支援。县委及地方武装与部队密切配合，历时6个月，作战200余次，歼敌1970人，给孙部以沉重打击。收复了被占领的解放区大部分村庄，取得了汤西反击战的胜利。

1947年5月，刘邓大军再次解放汤阴城，活捉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副司令刘月亭，歼敌近万人。这时冀鲁豫军区将原来管辖的汤东地区移交给太行军区，汤阴全境始成一体。县委县政府及时开展了清扫残敌的斗争。与此同时，还着重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和党团组织；二是组织军民开展剿匪反霸斗争，打击地主武装还乡团的反攻倒算活动；三是动员了上千名青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四是积极培训干部，支援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南下北上的干部达数百人；五是组织农会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六是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上述六个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

特殊的任务 难忘的护送

马 赛

编者按：马赛，男，1918年生，汤阴县宜沟镇蚕姑冢村人。原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政治处副主任，现离职休养。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办事处（沙区办事处）交通科长，曾护送过邓小平、陈毅、杨勇等领导同志和大批革命干部，还护运过不少军需物资。本文是马赛同志从事地下交通工作部分情况的回忆。

一、豫北地下交通线的建立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开辟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是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南部屏障，又是连接华东、华中地区与太行根据地，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桥梁，在抗日战争中处于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日军曾多次对我冀鲁豫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妄图把我们吃掉，却遭到我抗日军民的痛击，其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接着，日军又实行封锁政策，在平汉铁路两侧开挖了两条长300余里的封锁沟，沟宽、沟深均两丈有余，沟外沿上还架有铁丝网。同时在铁路沿线还修筑了不少碉堡，主要路口派有重兵日夜把守。他们还派兵严密封锁了卫河各渡口，对于过往行人严格盘查。由于日军的封锁，我们的冀鲁豫与太行山区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来往人员，运送物资都必须派遣大量部队掩护，且时常遭到敌人袭击。1940年8月，我冀鲁豫一分区政委闻允志同志率部队从冀鲁

豫根据地前赴太行根据地执行任务，渡卫河时遭到日军阻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另有我军一个团从太行根据地出发前来冀鲁豫，途经汤阴敌占区时遭日军袭击，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粉碎日军的封锁，上级决定开辟冀鲁豫到太行根据地之间的地下交通线。并于1942年初在内黄县井店设立了办事处，名曰：冀鲁豫沙区办事处。办事处设有敌工、交通、情报等科室。办事处的主任由四分区统战部副部长王乐亭同志兼任，秘书长是李毅之，我担任交通科长。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护送过往的革命干部，购置、护运军需及民用物资等。

沙区办事处建立之后，首先开展了对卫河以西地区伪军和地方武装头目的统战工作，并在敌占区逐步建立起了一些秘密联络点，为开辟地下交通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冀鲁豫到太行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逐步开通了。当时我们开辟的地下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沙区出发，在内黄县的后苇草坡渡卫河（渡河地点不固定），经过汤阴县的北五陵到任固一带村庄，从安阳县的辛庄、庞家湾、白壁、崔家桥一带通过，从安阳火车站北越过平汉铁路，再经洪河屯等地西上太行山，进入太行根据地豫北办事处。我们称之为“北交通线”。一条是以沙区办事处为起点，从浚县的老观嘴过卫河，经汤阴县的师庄、大小青山、宜沟三里屯一带过平汉路，再经冷泉一带过淇河西上太行山。我们称之为“南交通线”。1942年至1945年间，我们通过这两条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了二三千人次的革命干部，其中包括不少中央领导 and 高级干部。同时，还为根据地护运过许多军需、民用物资，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作为交通科长的我，在这两条交通线上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亲自护送的革命干部和护运的物资很多，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现将自

己印象最深的几件回忆于后，以飨读者。

二、护送邓小平同志之经过

1943年农历5月初的一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其爱人卓琳等一行抵达我们沙区办事处，要通过敌占区经太行根据地到延安去，组织上决定让我负责护送工作。接受任务后，我与办事处的王乐亭主任共同商定了护送路线。王主任又带我去见邓小平政委。我们二人一同来到邓小平同志的住处，邓小平政委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王主任首先把我向邓小平同志作了介绍，我又主动把要走的路线和通过敌占区沿途的情况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扼要汇报。邓小平同志听后和蔼地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圆满完成任务。”接着王乐亭主任又问我：“打算让谁和你一块去？”我说：“还是派交通员李志杰和老吴二人吧，他俩对沿线的地理情况熟，人缘又好，往返跑了几百趟，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从未出过什么差错。”邓小平同志和王乐亭同志听后都满意地点了点头。

为了确保护送工作圆满成功，做到万无一失，当天下午我和王乐亭主任又详细研究制定了护送方案。我们对护送途中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估计，并制定出了应付的措施和办法。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已是傍晚时分，我到交通员李志杰同志的住处，把他叫醒。李志杰同志因执行任务，一夜没合眼，午饭后才休息，显得特别疲劳。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小李，休息好了吗？今天晚上又有护送任务，你和老吴同志与我去，你看行吗？”一听说有任务，小李立即翻身下床，爽快地回答道：“行，保证完成任务。”每次给小李同志布置任务，他总是这样回答，这已经成了习惯。

我和小李一块从屋里走出来，办事处的大院里已经集合了20多个战士，交通员老吴同志也挤在战士们中间。这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上分别拴着两匹备有鞍蹬的高头大马和四匹驮着物件的骡子。不一会儿，王乐亭同志领着邓小平政委一行从屋里走出来。为了行动方便，邓小平同志与其爱人都化了装。邓政委头戴一顶新礼帽，身穿细布长衫，脚穿一双新皮底布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俨然变成一位上层社会绅士。卓琳同志也女扮男装，身着对襟细布中式上衣，出发时，王乐亭同志把大家送出村外。这时，我和王主任要扶邓政委上马，但他却笑着说：“这段路不过一百多里，我们的身体蛮好，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步行吧。”王主任叮嘱我：“路上要多加小心，遇到情况要见机行事，多向首长请示。”

我们离开井店，向西南方向快速前进。为了能够灵活地对待途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我对护送人员也作了精心安排。即让小李同志带领10名战士在前面开路，我与6名战士牵着骡马与邓小平、卓琳等同志同行。老吴同志带领10名战士断后。队伍拉开一定距离，首尾相顾。我们走出根据地后又顺利地通过了浚县孙步月反共自卫团的统治区，约莫二更时分到达卫河东岸的老观嘴渡口。我让大家隐蔽在堤后，派小李前去渡口侦察情况，寻找渡船。不大一会儿功夫，小李急急忙忙回来向我汇报渡口的情况。他说，不仅没有渡船，就连那根拦河摆渡的铁丝绳也不见了。我听后又亲自到渡口查看了一番，情况与小李汇报的一样，仍然看不到一只船影。我想这一定是日伪军为了阻止我军夜间渡河连绳带船都给弄去了，这一下可难住我了。“这里水深流急，没有船用什么办法渡河呢？”我反复思忖着。这时邓政委低声问我：

“附近有没有能趟水过河的地方？”这一下提醒了我和小李，还

没等我开口，小李抢先答了话：“有，往上走一段有一个浅水滩，可以趟水过去。我是本地人，小时候经常从那儿趟水过河。”邓小平同志说：“既然能趟水过去，咱们就趟水好了。”小李领着大家顺河堤向南走，不多时来到了那个浅滩。这时邓小平同志又鼓励大家说：“我们红军长征时，前边有敌人封锁堵截，后边有敌兵尾追，上边有敌机轰炸，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没有被吓倒，照样渡过了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一条小小的卫河能挡住我们吗？不能，没有船咱们就趟过去。”邓小平同志的一席话，使大家深受鼓舞。同志们立即脱掉外衣和鞋袜下水渡河。开始时水较浅，后来水渐渐深了。到了河心，水已漫过了胸口，水流急，脚下也直打滑，我紧挨着邓政委，生怕发生意外。邓小平同志却关照大家：“要把脚踏实、踏稳，咱们大家互相拉紧手，千万不能让河水冲倒了。”就这样，你拉着我，我拉着他，结成了一条冲不断的锁链，一步一步地试着往前走，终于胜利地渡过了卫河。上岸后，大家揩干身上的水，穿好衣服，继续整队西行。

离开河堤后，小李在前面领着大家从堤下的麦田里斜着走去。队伍进入麦田还未走多远，邓小平同志便叫住小李：“小李同志，为什么一定要从麦田里通过呢？”小李说出了走麦田抄近路避开敌人的意图。邓小平同志深情地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损害群众的利益嘛！这些麦子很快就该收割了，我们走过去，要踏毁群众的多少庄稼啊！你说对吗？”小李含羞地答应着，我在旁边也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我想，邓小平同志处处想着群众，而农民出身的我，反倒忘记了这一点，真是惭愧啊！经邓政委提醒，我们赶忙从麦田里撤出来，又回到堤边，顺河堤向北走到一个村庄附近才又向西上了大路。这里已进入汤阴县境，邓小平同志一边赶路，一边与我们交谈。他详细地询问

了汤阴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抗日斗争开展的情况。他还向我们讲述了岳飞抗金的故事，以激发大家抗日救国的热情。经过整整一夜的行军，于黎明时分到达了交通线的中间站——乔村（属浚县），这里是天门会管辖的地盘。我们一到，天门会中的我地下党的负责人傅凌云同志立即出来迎接。遵循地下交通晓宿夜行的老规矩，我们决定白天隐蔽休息。老傅将邓政委和卓琳同志安排在一位姓姜的开明绅士家的南楼上住下，把马匹分散在可靠的群众家中，并在村旁和路口加岗添哨，加强防卫。我们武装护送人员轮流在姜家院内外值班放哨。

午饭过后，我对设在院内外的岗哨进行巡逻检查，当我走到邓小平同志休息的楼下时，邓小平政委那亲切感人的谈话声从楼上传了下来：“抗战已进入后期，日军再耍什么花招也绝改变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只要赞成抗日，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要团结他。谁能为抗日多做好事，前途肯定是光明的……”我听后心情非常激动，心想邓小平政委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利用休息时间，抓紧点滴空隙，为党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时每刻都在为抗日救国操劳啊！

我们在乔村休息了一天，入夜又继续上路西行。很快便走出了天门会的辖区，进入宜沟镇（属汤阴）的日伪军封锁区。这一地区是交通线上最危险的地段，前面不远就是平汉铁路，敌人对平汉路封锁得很严，因此我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一路上，人不语，马不嘶，静悄悄地疾驰前进。当快要接近铁路时，我让大家停了下来，派小李、老吴带领8名战士匍匐前进，去侦察一下敌情。他们侦察后向我报告：“在铁路口四处搜查，并未发现敌哨，只听得左边的碉堡里的敌人正吆五喝六地喊着“地子九”、“天杠”、“老子闭十啦”。听了报告，我暗自高兴。吆喝声和

1

笑骂声表明，敌人正赌得热闹。我说：“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通过的好时机。”立即命令小李和几名战士分别把守铁路与封锁沟过路口的南北两侧，严密监视敌人。我和其他战士护着邓小平和卓琳同志悄悄地穿过了平汉铁路和封锁沟，这时我才轻轻地松了口气。过了铁路，邓小平同志边走边对我说：“我们这么多人马能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通过，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我回答说：“首长过奖了。”接着，邓小平同志又说道：“这是个险要的关卡，如果能做好敌人的争取和瓦解工作，就会对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更有利。”他还指出，伪军中除了少数铁杆汉奸是死心踏地地为日军卖命外，大多数人是被迫当兵的，是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劳的，其中有些人还具有一定的反日爱国思想，暗中倾向我们。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运用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去争取他们，以便孤立主要敌人，最后战胜敌人。邓小平同志的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从那以后我们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采取积极措施来做对敌人的瓦解工作。不久，我地下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把驻守在宜沟碉堡中的伪军排长除掉了，换成了打入伪军内部的一名姓张的地下党员任排长，把这个碉堡里的大部分伪军争取了过来，他们在暗中为我们的地下交通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过了铁路没走多远，就进入了丘陵地带，道路崎岖不平，走起来比较费力，但大家与首长边走边谈，心情非常舒畅，并不觉得劳累。大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就来到了淇河岸边。这是进入太行根据地的最后一道关卡。属大土匪扈全禄管辖的地盘，平时扈匪对这个路口把守得很紧，一般不易通过。于是我让大家再次隐蔽起来，仍派小李、老吴带几名战士上前侦察敌情。他们到了岸边，看见有十五六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在巡河，那些家伙南走走、

北转转，死守着这唯一可以涉水过河的浅滩不肯离去。小李将岸边的情况向我汇报后，我心中有点着急，我想，这一段淇河不是水深流急，就是两岸的坡陡岸高，加上我们还有骡马驮子，根本过不了河，就是有能过河的地方，过去了也上不了岸。怎么办呢？和敌人拼杀夺路吧，若被敌人咬住不放，引来附近的敌人就更糟糕了。战士们一听说有敌情，纷纷向我请战：“马科长，快下命令吧，坚决消灭敌人，掩护首长抢渡淇河！”战士们表示，拼死也要完成护送首长过河的任务。当邓小平同志了解到别处没有可以过河的地方后，却镇静自若，不慌不忙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若用‘调虎离山’计把敌人引走，我们就能过河了，只是要给‘调虎’的同志增加一些危险，你看如何？”我一听，感到这是个好办法，就高兴地说：“行，我们的交通员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现在又是深夜，‘调’走敌人安全归队没有问题。首长放心，就用这个办法吧。”一听说要用计“调虎”，小李、老吴二人都争着要去。我考虑他们二人各自的特长，决定派老吴带两名战士前去“调虎”，用枪声把守河的敌人引到东南方向去，然后再甩掉敌人，迅速归队。命小李仍然在前边带路，抢渡淇河。

老吴带着两名战士出发了，一会儿，东南方向响起了枪声，巡河的敌人慌了手脚，狼嚎似地喊叫着“八路！八路！别让他们跑了，快追！”随着喊叫声，敌人的枪声也乱响起来。随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追赶，枪声越来越远。

由于巡河的大部分伪军都向东南方向追“八路”去了，河口只留下两个哨兵把守。小李与一个大个子战士匍匐向前接近敌人。在距敌哨二三步远的地方被敌人发现，有个伪军正要举枪射击，小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刺刀插进了他的心窝。另一个伪军的脑袋也被大个子战士用枪托子砸开了花。消灭了两个巡河哨

兵，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大家护着邓小平、卓琳同志趟着齐膝深的河水，顺着浅滩，安全地渡过了淇河。我们过河不久，前去调“虎”的同志也都气喘嘘嘘地赶了上来。邓小平同志关切地问他们：“你们辛苦了，没有出问题吧？”老吴同志兴奋地回答：“没出什么问题，首长放心吧。”小李在一旁插话道：“首长用兵如神，出奇制胜。”邓小平同志却笑着说：“胜利是大家辛苦得来的，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呀！”接着邓小平同志又风趣地说道：“今天敌人逼着我们走夜路，趟河水，等我们抗战胜利了，建成了社会主义，上哪儿去就可以坐汽车，坐飞机，乘轮船。”说得同志们都大笑起来。就这样，一边说一边走，天亮到达了目的地——太行根据地交通站泉寨村，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邓小平同志告别，迎着初升的太阳踏上了归途。

三、护送陈毅同志之经过

1944年元月的一天上午，李毅之秘书长派通讯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正好王乐亭主任也在那里，还有几位客人。见我进来，王主任指着一位身材魁伟的同志给我介绍说：“这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要经太行到延安去，决定派你护送过路。”我久闻陈毅军长的大名，但从未见见过面，一听介绍，心情格外激动。我把陈毅同志上下打量了一番，只见他宽宽的脸膛，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身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显得非常威武。王乐亭主任见我发楞，就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次护送事关重大，要认真对待，我们先研究一下护送方案。”

李秘书长把交通线路图摊在办公桌上，我们几个围坐在桌旁。王主任首先介绍了南、北两条地下交通线的情况，对其各自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比较，然后征求陈毅同志的意见。陈毅同志沉

思了片刻，用浓重的四川口语风趣地说：“不要紧，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走哪条路好，由你们决定。”听陈毅同志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心中也踏实多了。这时，王乐亭同志指着交通图上的北线说：“就走这条线吧，昨天我们派到河西敌占区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虽然日伪封锁铁路口的兵力增强了，但沿途各据点的伪军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走这条线要比走南线安全得多，你们看怎么样？”大家表示赞同。行动线路确定之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具体的走法，最后决定化装通过。让陈毅同志化装成一位商人，骑上骡子，化名为王良富，让我化装成帐房先生，骑自行车与陈毅同志同行。路上如遇人查问，就说是去西边做生意的。为了缩小目标，陈毅同志的警卫人员由办事处安排其他同志从另一线路护送过去。陈毅同志说：“你们熟悉情况，我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哟。”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样，护送陈毅同志的任务就落在我一个人肩上，心中难免有些紧张。虽说自己具有多年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经验，安全护送过不少领导干部，但自从来到沙区办事处工作，自己跑南线的时间多一些，对南线比较熟悉，遇到特殊情况好对付，而对北线相对来讲则比较生疏，生怕发生什么意外。王乐亭主任好象猜透了我的心事，就进一步作解释：“老马不要紧，有内线协助，到接头地点有人接你们。”

第二天，陈毅同志穿上了长袍大褂，头戴礼帽，围了一条长围巾，脚穿新皮鞋，打扮成了一位阔商。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陈毅同志骑着骡子，我骑着自行车，我们二人走得很快。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就赶到了后苇草坡卫河渡口。恰好这里停靠着一艘渡船，一位船工见我们准备过河，便很有礼貌地把我们让到

船上，并问道：“二位先生去什么地方？”我小心地回答：“上安阳做生意。”那天早晨风平浪静，船在水面上划得很快，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到了对岸。上岸后向西北方向走了大约20里路，来到故城村（属汤阴）附近，这里是伪军的一个据点。陈毅同志问我：“这个据点有多少伪军？我们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做得怎样？”我回答说：“这个据点不大，只有二三十个人，属土匪局队长秦芝所管辖，与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接着我又向陈毅同志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土匪、伪军情况及我们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开展的情况。我告诉陈毅同志：“这一带的土匪伪局子很多，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大，日军驻在城里很少出来。伪局子的头目多是两面派，他们明里讨好日本人，暗里也应付我们，为我们办事。他们这些人一是爱钱，二是爱枪，为了争取他们，让他们给我们送情报跑交通，我们还给他们发一份饷，即每月折合45斤小米的钱，秦芝就是其中的一个。逢年过节，我们办事处还要给他们送些礼物。所以，虽然我们从这一带过往的人员很多，但从来没有出过事。”陈毅同志听后连连点头称赞我们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做得好，并进一步指出：“这个办法好，但不要掉以轻心，敌人的反动本质会使他们啥子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为了争取时间赶路，我们没有进故城村，直奔白璧北务村郭庆安家。郭庆安是一位绅士，有抗日爱国思想，拥护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同时与土匪头子王自全也有些联系。经过地下党组织做说服动员工作，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他很乐意为我们办事，他的家成了我们地下交通线上的一个联络点。我们的好多干部都是在他的热情帮助下通过敌占区的。我们于中午时分到达郭庆安家，郭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备了午饭招待。饭后，我向郭详细询问了近来敌人的活动情况，郭都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崔家桥王自全的情况时，郭庆安说：

“王自全是一个大恶霸，很狡猾，不过他对我们还是有些顾虑的。由于他在抗战初期被我军俘虏过，深知自己不是八路军的手，他也不知道我们对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人的汉奸与一般伪军是有区别的，因此他不敢胡来。再说他的内部也有我们的人，如果出了岔子，会替我们说话的。”话毕，我提出要马上出发，郭庆安知道任务紧迫，也不挽留，骑上自行车就带领我们直奔崔家桥而来。离崔家桥越来越近了，我的心跳得也越来越快了，我想王自全是个土匪头子，他有奶便是娘，一切事情完全以他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向来不讲一点信誉，虽然组织上事先作了精心安排，万一他翻了脸怎么办？因此，我再次叮嘱老郭：“千万要保证首长的安全，不能出丝毫差错。”我对他说：“王自全要问，就说是从东边过来的商人，去西边做生意的。”郭庆安一一应允。不一会儿，我们进入村来到了王自全的司令部门口，只见大门两旁分别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我取出王自全的信件向门卫一亮，说了声找王司令，门卫也没敢阻拦，我们三人就大大方方地进了大门。一个带班的士兵把我们让到会客室，勤务兵端来了洗脸水，沏上茶，郭庆安与那个带班的士兵一同到后院向王自全通报了情况。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王自全的参谋长来到会客室对我们说：“司令忙，抽不出身，特地派了一名贴身护兵送你们。为了避免途中麻烦，我们开了一封通行证明信。”我们接过信件，表示谢意后就告辞出来，扑上大路向西而去。

由于有王自全的护兵在前面领路，途中没有遇到什么岔子，顺利地通过了平汉铁路。我们通过主要危险区域后，就让王自全的护兵返回去了。我们二人继续赶路，走着走着，迎面遇到了四个斜背着大枪，歪戴着帽子的伪军巡逻兵，狭路相逢，躲避是来不及了，如果东躲西藏的，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这时陈毅同